责任编辑：戴菁　E-mail:daijing314@163.com　电话：010-62805132　　2014 年 1 月 20 日

国外大城市如何治“堵”

□陈玉光

我国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愈演愈烈，城市的运行效率大大降低，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环境污染加剧，居民通勤的经济、时间成本不断上升，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国外一些大城市在治理交通拥堵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做法，取得了不少有益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通过城市功能区的调整引导出行方式，控制交通流量

一是建设副中心，使城市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世界许多大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单中心“摊大饼”式的空间扩展方式，在城市外围建设了大片仅具有居住功能的“卧城”，居民上下班交通流量巨大。为解决这一问题，世界不少大城市尝试通过调整空间结构，遵循“职住平衡、生态平衡”的原则，在大城市周边建设副中心城市的方式来控制交通流量。法国巴黎通过在郊区建设卫星城，疏散中心区人口和不适宜在中心区发展的企业，有效减轻了市内交通网的负担。日本东京则以公共交通为导向，鼓励在火车站和地铁站周边地区进行高密度开发，以增加就业岗位和居住人口。东京的一些火车站周边地区已成长为商业中心，交通功能和商业功能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城区的交通压力。二是优化建成区功能配置。新加坡通过合理设计规划居住区与办公楼及生活娱乐设施，有效地抑制了因居民远距离出行导致的拥堵现象。新加坡将全部土地规划为 55 个小区，与我国住宅小区的功能主要是居住功能不同，新加坡的小区不但有居住功能，还有办公楼、购物中心、学校、医院、餐饮、娱乐、公园等等，居民的上班与生活休闲基本上可以在一个小区内解决，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通勤。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国外发达国家在城市“汽车化”进程中，大多经历了“私人汽车膨胀→道路拥挤阻塞→重视发展公共交通”的发展历程。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增加供给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的，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公交优先”作为交通发展的基本原则。海外大都市公交系统承载的人口出行比例平均为 75%，其中，华盛顿和东京均达到 80%。

一是通过立法和政策手段加以扶持。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建立了相关立法，对公交运营加以规范。巴黎、伦敦、纽约、东京四大城市都在投资上向公共交通项目倾斜，增加对公交企业的补贴，以扶持其改善运营能力。公共交通系统由轨道交通（包括地铁、有轨电车、市郊快速列车）、BRT（快速公交汽车）、公共汽车等构成，各种运载工具承担的职责有明确分工，优势互补，紧密联结，换乘方便，形成了高密度、高覆盖、高效率的公交营运网络体系。二是在道路和交通管理上确保公交优先。法国巴黎设置了 480 多条全天或部分时间禁止其他车辆使用的公共汽车专用道。伦敦实行公交专用道、公交信号优先以及一体化智能卡票制，公交车优先线路占全线路的 85%，其“红线”优先路线仅供公共汽车使用，严禁其他车辆使用。韩国首尔的公交车专线设在马路中央，连接市内外的干线中央也辟出红色单向车道专供公交车行驶。

限制私人小汽车的拥有量和使用

小汽车与自行车、公共交通工具相比在运行中所需人均道路面积及停放面积方面是最高的，因而效率最低。所以，很多国家都对私人小汽车加以限制。一是严格控制私人小汽车拥有量。欧洲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征收高额消费税，法国为 33%，荷兰为 47%。丹麦的税收额度约为购车费用的 3 倍，且税款随车重和排量的增加而增加。新加坡自 1990 年起实行车辆数年度配额和公开招标竞买“拥车权”制度以来，小汽车保有量增长率从 6%降至 3%。二是通过收取道路拥挤费的办法重点限制小汽车出行量。小汽车以牺牲较多公共空间资源效率换得较大个体时间效率与舒适性，决定了使用者必须为此付出较高经济成本。英国伦敦从 2003 年 2 月 17 日开始对进入内环线范围内的车辆收取拥挤费，方案实施后有 40 多万伦敦人放弃私家车改乘公共交通工具，拥挤减少 40%，车速提高 37%。韩国首都自 1996 年底开始对每辆私家车每天征收 2000 韩元的“交通拥挤费”，该规定实行后小轿车通行量减少了 53%，车辆通行速度提高了一倍。三是减少中心城区泊车位，收取高额停车费。四是欧洲各国普遍实行较高的燃油税，目的在于通过增加小汽车的出行成本抑制小汽车的滥用。五是鼓励合乘。欧美国家都积极倡导人们拼车，在纽约的高速公路上，3 人以上合乘的车辆可在专用快车道上行驶，否则就只能在普通车道上行驶。现在，在国外的许多大城市，绝大多数人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家庭小汽车主要用于走亲访友、到偏远地区办事或外出旅游。

汽车出租与汽车共享

为减少私家车过多导致的交通拥堵，自 2011 年 12 月始，巴黎推出了租赁汽车的“Autolib”（汽车自由行）服务。首批共有 250 辆电动汽车和 250 个租赁点上马，截至 2012 年 6 月，已有 1740 辆电动汽车和 1100 个租赁点面向公众服务。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1%的受访者对“Autolib”项目表示感兴趣并想尝试租车。柏林推出的是汽车共享服务。在一个人不用车的时间，车子可以由另一个人使用。目前，柏林已经有 219 个汽车共享站。使用时，顾客缴纳少量费用，然后得到一张密码卡。拿着这张密码卡，人们可以到附近的停车点取得车钥匙，用车完毕后，将车停到就近的停车点，再把钥匙放回停车场的密码箱。顾客的费用通常按照实际用车的时间和里程计算，一般月底会收到账单。汽车共享服务，可以减少私家汽车的数量，提高汽车的利用效率。据德国研究人员测算，对于有 1000 万以上常住人口的大城市来说，采用汽车共享方案可减少数以万计的私家车。

尽量减少公务用车配备数量，严禁公车私用

美国政府部门购买公务用车都要提请同级议会批准，且要定期向公众公布使用情况，因此，政府对公务车的数量控制非常严格，有的市政府只有几辆甚至没有公务车。公务车的车牌上会注明只能由政府使用，如果在下班时间公务车停在饭店、娱乐场所门前，往往会受到举报。芬兰政府官员的专车只限在执行公务时使用，如果某人要求使用专车上下班，则必须将这种待遇折合为个人收入（大约相当于每月 1000 美元）缴纳所得税（每月约为 300 美元）。这些做法既为纳税人节省了开支，又减少了因公车滥用对交通带来的压力。

利用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统提高城市交通协调管理水平

世界银行相关交通专家认为有“20%的交通堵塞源于管理”。因此，世界各国大城市都致力于利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ITS）提高城市交通协调管理水平和道路使用效率。美国是应用智能交通系统管理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其智能交通系统主要包括出行和交通管理系统、出行需求管理系统、公共交通运营系统、商用车辆运营系统、电子收费系统、应急管理系统、车辆控制和安全系统 7 大系统和 29 个用户服务功能。该系统应用后可有效提高交通运输效益，使交通拥挤降低 20%，延误损失减少 10%—25%，车祸降低 50%—80%，油料消耗减少 30%，废气排放减少 26%。

鼓励步行和骑自行车出行

在交通拥堵的大城市，既环保又有益于健康的步行、骑自行车出行等交通方式虽然低速但绝不低效的理念如今已被大多数西方人所接受。一是在城市中心区公交发达、商业繁华的地带开辟步行区——“交通绿岛”。步行区的设立不仅在疏导交通上起到了显著效果，且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以及城市环境与景观的改善。巴黎、慕尼黑和苏黎世的步行区均已成为城市中最精彩、最有吸引力的亮点。二是提倡骑自行车出行。丹麦的哥本哈根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形成了局部自行车道网，哥本哈根居民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骑自行车出行的传统。为鼓励市民骑自行车出行，哥本哈根市政府还特意建造了一条自行车“高速路”，使用特别的交通信号系统，尽可能地减少中途停靠，骑车族几乎可以“一路绿灯”。“高速路”途中还设有自行车充气站、修理站和停泊站，可以为骑车族提供诸多服务。哥本哈根成为远近闻名的“自行车城市”，超过 40%的市民选择骑自行车通勤。骑自行车出行改善了哥本哈根市民的健康状况，据测算，这可以为政府每年节省 3 亿丹麦克朗（约合 3 亿元人民币）的医疗支出。而自行车“高速路”，也使哥本哈根市每年减少了 7000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实行弹性工作时间

美国圣何塞市上下班时间交通非常拥挤，为此，部分公司采取灵活的弹性工作时间，让员工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在不同的时间段上班。如果工作性质允许，有的员工每周五天都可以在家工作，不需要到公司上班，而大多数人则可享受每周在家工作两天的政策。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和高效率，同时又有效缓解了城市的交通压力，可谓一举多得。

（作者单位：青岛市委党校）

健全决策咨询　建设新型智库

□梅丽红　胡静波

近日，上海市委党校举办了首届高层次决策咨询研讨会。会议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共同举办，来自京沪知名智库、科研院所及政府相关机构代表，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开展决策咨询研究，以及提升决策咨询管理与服务能力两大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智库不是“纸库”“滞库”，要有全新的视野与理念

目前我国大大小小的智库，数量不少，但国际影响力与当前中国发展的实力、地位及需求还不相称，没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当一部分成了“纸库”“滞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直言，中国的智库发展，“起了大早，赶了个晚集”，按照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衡量国际智库的三大标准，即独立性、质量水平和影响力，中国智库 2178 个，排在全球智库里面仅有 3 个。

很多专家指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内经济社会结构进一步发生深刻而复杂的整体性变迁，智库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提出要“发挥思想库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既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为各类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有专家研究认为，智库关键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反应力，智库必须跟上快节奏的决策步伐；二是创造力，智库应该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成果进行提炼、综合，形成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三是影响力，智库的价值在于影响决策；四是独立性，这是智库最具有争议的方面，其核心在于背后的资金是否影响到研究的可靠性、严肃性和相关性。

关于中国智库发展的定位问题，魏建国认为，智库建设首先是个理念问题，智库不是解读政策，而是引导政策制定。现在很多的智库都在解读政策，怕思想交锋，怕观点冲突，或者是单一为企业服务，目前决策咨询成果能够发挥作用的为数不多，缺乏前瞻性与战略性。其次，中国的智库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国家利益重点是战略利益。

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王德培坦言，不管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智库，都要坚持智库的学术性和原则性，要客观、中性、冷静、实证，不能掺杂太多价值取向的东西，因为世界观、方法论不一样，最后导致的分析结论就会不一样。同时，他还认为，智库除了具有独立性还要有定力。

智库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更加开放的胸怀和更加宽阔的全球视野。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洪民荣认为，智库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特别是网络的发展，除了传统组织形态意义上的智库外，还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智库，智库已经从有形发展到无形，从实体发展到虚体，从封闭发展到开放。如网络智库，它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咨询的平台。技术智库就是用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不需要利用自己的大脑去分析，它把所有的变量输入到计算机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分析。

决策咨询研究关键在于选好题、做好题、送到位

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研究员用“选好题、做好题、送到位”九个字概括了决策咨询研究流程的关键要素。“选好题”是形成高质量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的前提和首要环节。一个好的决策咨询机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花 50%的精力研究选什么题。好的选题，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选题要有“提前量”，才能引领政策。学科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的区别在于，学科研究犹如狙击手，对着目标瞄准，打准了就是本事，而决策咨询研究是打飞靶，要快速、准确打中靶心，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做好题”最难的是要有一种做幕后英雄的境界。一是要发挥所长；二是要突出重点；三是要以小见大；四是要准确精要。“送到位”就是要在关键的时间送给关键的人，路径非常重要。

新华社上海分社总编辑助理杨金志认为，决策咨询研究应“吃透两头”。首先是“吃透上头”，要有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要把准大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关注中央关注的问题，重点研究突出的问题，着眼于当前和实际，不仅是暴露问题，更要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其次是“吃透下头”，要深入“田间地头”寻求答案，发挥决策咨询成果在“两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有专家指出，智库建设包括决策咨询研究，既要有战略层面的宏观把握，也要有具体的微观操作，既要有国家智库，也要有地方智库，既要有综合智库，也要有专业智库。决策咨询研究形式很多，可以是报告式，也可以是演讲式，智库建设应该多途径的阐述观点，影响政策，要敢于对话交锋，不仅关注对政府的影响力，更要关注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国际的影响力。一位长期与日本智库交流与合作的专家介绍，日本的很多研究者研究的问题都很小，甚至长期跟踪一户人家，一个小问题，一个操作层面上的问题，这也是决策咨询研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建言献策的能力与义务。

开放合作交流，提升决策咨询研究管理与服务水平

信息与通道是决策咨询研究管理与服务部门最受关注的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是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现在领导干部的信息来源太多，也没有精力处理海量信息，使得很多好的信息被无用的信息淹没掉，信息系统本身需要再加工、再整理。

与会专家达成共识，决策咨询研究应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开放合作研究非常重要。目前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的招投标单位不断增加，这些决策咨询研究都需要加强信息沟通和合作，实现资源互补。也有专家认为，决策咨询管理部门既要有“短平快”的项目研究，也要引导一些团队对某些问题、领域进行长期持续的跟踪研究，同时管理部门也要加强知识管理的能力与水平，加强数据库的建设，对已有的研究队伍现状以及各类专家研究特长要了如指掌。

关于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的评价认定和激励机制，专家们置疑，领导批示是否一定能够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有的研究成果领导批示了，但未必落实并产生实际效果；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时间检验是误导了领导。因此有专家建议，两年一度的市政府决策咨询奖的评选，成果检验的周期可以更长些，不唯领导批示，关键看成果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与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

会议综述

再谈学术精神

□武晓超

谈学术精神，有两重顾虑。一是出于个人的顾虑。人微言轻，学术资历更浅，遑论学术成就，何敢奢谈学术精神？但我想，在奋起直追前，先廓清思想的疑虑或给予精神的激励，未免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出于时代的顾虑。这是个“唯物”的时代，独不缺的是金钱、物质、资本，但思想、灵魂、精神等方面就显得相对贫弱了，耳边常听到灵魂掉队、思想惨淡、精神涣散等喟叹。此时侈谈学术精神，或有不合时宜之谓。然忠言只是逆耳。斗胆略表新声，不揣冒昧，诚恳求教。

学术精神首要强调的必是自由精神

学术研究的自由精神在西方理论和思想界具有深刻的共识，他们对学术、思想自由的描绘和塑造总是令人震撼和向往。罗丹的“思想者”雕塑生动地展现了自由思想的崇高力量。马克思以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自况，表达了对学术自由的无限景仰。人文历史上一切哲学、艺术、文学、宗教、道德的最高成就，都是一种内心自由的表现和学术自由的成果。

然而，学术自由并非就是信马由缰。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客观条件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这不得不说是一定的制约和规范。一方面，学术研究必然受制于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的变化发展。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是如此。尤其社会历史科学更是要受制于历史前提和社会环境。社会科学研究超越于特殊时代和具体国情之上，若然东成西就自是可嘉，若然南辕北辙、南橘北枳，肯定不是研究者所曾期许的。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还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和产生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学术前沿必须有理论基础和文化后方的坚定支撑。因此，理性才是学术研究和科学发展的逻辑基础，而绝非随性或者任性。

西学东渐以来，自由精神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得以广泛宣传，同时也实际促进了我国的学术发展和文化繁荣。这不仅得益于个人意义上有学术大师如陈寅恪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推崇和垂范，更离不开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化政策的积极培育和引导。

学术精神在中国传统精神中去追问，集中体现为“道”的精神

从立身、立言、立德不同维度上，“道”的精神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和作为传统文化、政治精英的士林阶层中，得到系统而丰富的继承发展。析之以分说，似可从中读解出道术之辩、道器之辩和道治之辩三重涵义。

道术之辩，或道业之辩，是以儒家学问和传统思想的传承接续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对自身职业精神的高度概括，在唐代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表现得最为明确。传道授业是传统知识分子从事精神文化生产、实现自身价值和参与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由于传统儒家思想和学术主要集中在文化、思想领域，道之在业和业以传道的紧密联系是不言而喻的。而现代学科门类和专业知识的急剧分化，尤其自然科学的极大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消解和改变了专业研究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但是，为师传道、授业解惑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职业和事业统一发展、实现个人和社会双重价值的现实路径。

道器之辩，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反映的是传统儒家对超然态度和超越精神的理解和追求。原意不及细论，姑且假借比喻学术研究中对客观性、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孜孜以求。在一般层面上，“道器之辩”指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经验抓规律，从形而下的现实表象世界晋升到形而上的科学真理世界的重要途径。在更深层面上，“道器之辩”还指示了学术研究通过理论反思和批判，实现思维转换、超越和学术创新、飞跃的重要途径。在此，“形下之器”指的是思维保守、理论僵化和教条主义，“形上之道”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学术创新和科学发展之道。

道治之辩，反映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从学术研究和思想宣传出发，通过积极的咨政议政等，致力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责任担当精神。《礼记·大学》里的“修齐治平”首先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宗旨和价值理想，同时也传达了儒家由内圣向外王、由修身致知向经世致用的治学路径。这一宏大理想在宋明之际更加明确而系统。宋朝张载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鲜明地表达了传统文化精英积极介入文化、社会和政治建设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现代科学划分体系中，这种对于人民、国家和社会的终极关怀和担当精神，首要承载和体现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身上。虽然在时代变迁之后“道统”的内涵和外延、内容和形式等必然发生变化，但是知识分子承担的引领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方向的责任丝毫不能推辞或懈怠，而且现代社会发展也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途径和手段。

学术精神在现时代必然要体现为实践精神

在我看来，倡议实践精神最为鲜明又最为深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莫属。实践之于马克思，不仅仅是以“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自称，不仅仅是一种“改造世界”“实际地改变现存事物”的理论指向，更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把实践作为检验自身理论，检验学术、思想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都必须在实践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被实践所否证和抛弃。

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分子，实践精神至关重要。如果说自然科学必须在纯粹客观的条件下研究自然存在的话，人文和社会科学因为是由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人和社会所决定的，必须奠基在现实的人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上。毋庸置疑的是，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舞台。拒斥实践，否认实践对人和社会的决定性意义，只能陷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否认实践就是否认现实，深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取，更应为现代学术研究所摒弃。

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而深刻决定了现代学术、现代思想的实践精神。不仅传统科学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汲取实践的力量，理论创新必须以实践发展为动力和源泉，更为显著的是，现代学术还创新了日益繁多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等，每一门新的学科都必然面向和反映人类新的实践，都是一部正在打开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物质和精神交往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和实践活动的新书。

面向实践就是面向群众。今天，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和人们素质的提高，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分野已经逐渐淡化。随着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以知识、技术和管理阶层为主体的中间等级日益壮大，更弥合了精英文化和群众文化之间的差距。现代学术研究应该认识到，人民群众不仅拥有思想文化的天赋权利，而且提高了思想文化构建的素质能力，人民群众更是实践创新的主体，是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因此，面向群众、面向实践，必然体现了现时代的学术精神，也体现了现时代的理论文化姿态和思想宣传路线。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社部）

学术评论